

台灣近十年教育領導碩博士論文的分析：女性主義的觀點

潘慧玲

台灣師大教育系教授

梁文蓁

台灣師大教育系碩士班學生

陳宜宣

台灣師大教育系碩士班學生

本文刊載於台灣近十年教育領導碩博士論文分析：女性主義的觀點。
婦女與兩性學刊，第 11 期，151-190 (2000)。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以女性主義觀點檢視國內近十年來教育領導碩博士學位論文研究。文中先探討女性主義觀點與教育領導研究，其次進行學位論文分析，主要由三個面向切入：（一）論文中呈現的是誰的聲音？女性的聲音是否妥適地出現？如果沒有，是以何種方式（如排除、假置入或異化）被消音或扭曲？（二）在考量性別因素時，係以何種立場進行探究？是以女性為主體，重視女性特殊經驗的陳述，抑或從歷史、文化、脈絡下探討性別的建構，從而檢視社會建構的傳統角色如何轉譯（translate）至工作場域中？（三）研究是否具有實踐的政治意圖，冀求從結構面、政治面、人際面促發社會變革？整個的論析涉及了方法論、知識論與政治的議題。在分析國內教育領導研究後，發現絕大多數的研究籠罩於實證派典下，量化方法的使用佔最大宗。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研究者對於性別的關注，多以男性觀點為中心，故在 75 篇論文中，有 42 篇未能考量性別變項；在另外 29 篇的論文中，研究設計雖納入性別變項，唯仍以男性觀點闡釋性別的影響；而即使在四篇以女性為焦點的論文中，較具女性觀點者僅有兩篇。此現象顯示我們在教育領導研究中，如何適切地處理婦女經驗，尚有極大的成長空間。

關鍵詞：教育領導、女性領導、校長領導、女性主義觀點

壹、前言

透視世界核心知識體系的建構，女人常位於邊緣地位，被排拒於知識生產之外。籠罩於實證主義派典之下，以男性為主導的世界觀被當成普遍化的準繩，用來衡度與評量所有人類的經驗。如果從知識背後所隱藏的權力意涵加以探究，可以發現由於知識系統的生產與傳播權力為男人（尤其是西方白種男人）所掌控，致使女人的經驗不但無法被適切的詮釋，更處於被壓抑與被宰制的地位。

女性主義的興起，挑戰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單一思維體系。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質疑許多理論構念的效度。台灣在近十年來，受到西方婦女運動、女性主義思潮以及本土婦運的影響，性別議題也開始熱門起來，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焦點。在這十年中累積了相當數量與教育相關的性別論述，然細究其主題，發現有不少是關乎課程（尤其是教科書中性別意識型態的分析）與師生互動的主題，教育行政方面的研究則較少。

事實上，西方自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便陸續有學者以性別觀點重新檢視現有的教育行政理論與研究（如 Blackmore, 1989; Gosetti & Rusch, 1995; Shakeshaft, 1989）。而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如 Gilligan（1982）、Noddings（1984, 1992）所提出的關懷倫理概念更影響了學校倫理學的建構。當西方已開始省思原有理論的適用性與周全性時，我們實不應不加省思地繼續套用與移植西方以男性為中心所發展的教育行政理論。

為開啟新的視窗，豐碩教育行政領域的內涵，本文期以檢討過去的相關研究作為努力的起點。易言之，本文以教育領導研究為範疇，採女性主義觀點進行近十年來碩、博士學位論文研究的分析。希望本文探討所得，能激起國內更多有心人士，以不同的視野重建含納兩性經驗與觀點的教育行政理論。

貳、女性主義觀點與教育領導研究

一、女性主義觀點

當採女性主義觀點檢視國內教育領導碩博士論文，以瞭解不同的研究者在一以男性為主導的知識體系中，如何處理女性經驗時，我們必須認知到女性主義並非為一單一的主張，其有不同的流派，而流派間的主張與訴求互有差異。例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強調平等；渠等認為性別間的差異並非天生，而是透過社會化歷程而形成，故如賦予男女相同的機會，則女性亦能表現得與男性一樣好。對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未能從結構觀點檢視女人被壓迫、身處於附屬地位的現象，其他

流派各提出了不同的主張。例如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企圖從資本主義的觀點做闡釋；基進女性主義嘗試從父權體制的解構著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兼從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進行解析。然上述女性主義的主張，被批評僅是反映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意識型態，故而黑人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思潮從而產生，揭示了種族、階級，甚或是被殖民經驗錯綜互動所譜出的論述。至於後現代女性主義則強調多元、變異，否定「婦女」為一統一不變的概念，並重視婦女的「能動性」(agency)，故強調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檢視婦女的定位 (positionality) (Acker, 1994 ; Tong, 1989 ; Weiner, 1994)。

存在於不同女性主義間的想法雖有歧異，但對於何者構成女性主義理論的核心要素則漸有共識，概括而言，有下列三項 (Riehl & Lee, 1996:907 ; Shmuck, 1996:345)：

- (一) 女性主義理論主張「性別」(gender) 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其有別於生物性別 (sex) 。”gender”賦予”sex”社會意義，而此意義隨著不同的文化、時間會有所差異。
- (二) 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女性與其經驗被摒除於知識建構之外，其批判現存的知識，並提供不同的觀點使知識得以轉型。
- (三) 女性主義籲求從政治面、結構面與人際面進行社會變革，促進權力關係的均衡與性別平等。

事實上，女性主義者並非只是研究女性，而是以女性的觀點看世界，故以「局外人 (outsiders)」的觀點批判主流文化，對於以男性觀點為中心的學術論述，致使女性主體性未能彰顯，女性經驗被忽視、省略、刻板化或扭曲等各種現象加以撻伐。Abbott 與 Wallace (1997) 曾對充斥著男性思維的社會學提出批判，而這樣的批判亦適用於每個社會科學領域 (Abbott & Wallace, 1997:6 ; 俞智敏、陳光達、陳素梅、張君玫譯，1995:11-12)：

- (一) 一向以男人為重，並隱含了替男人說話的理論；
- (二) 把針對男性樣本的研究發現概推到全體；
- (三) 經常漠視女人切身的領域與議題，或認為不重要；
- (四) 當研究包括女人在內時，以一種性別歧視的扭曲方式呈現女人；
- (五) 很少把性別 (sex and gender) 視為重要的解釋變項；
- (六) 當性別被放入當變項時，它們僅是附加上去的，忽略了所用來解釋的理論正是正當化婦女附屬地位的理論。

對於男性宰制文化的現象，Thiele (1987) 亦指出在社會與政治理論中，存在著三種使女性無法現身 (invisible) 的形式：排除 (exclusion)、假置入 (pseudo-inclusion) 與異化 (alienation)。排除女性於理論的建構之外，將男性

經驗概化，用以解釋人類現象，致使女性的聲音無法被聽到，這是邊緣化女性經驗最明顯的一種作法。另一種較為微妙，邊緣化女性的作法是假置入。在形式上，理論雖涵攝了女性經驗，唯男性觀點仍是規範、常模，女性經驗僅具附加價值，被視為是一種特殊個案。然而當女性在研究中成為重要的探究對象時，如果仍以男性中心的價值觀、方法論與分類架構去分析她們的生活，則亦將產生異化女性經驗的結果。

除了分析男性觀點學術論述的形成機制，女性主義學者（如 Acker, 1994；Harding, 1987）亦致力於釐清女性主義研究所具有的特徵或預設，以有別於一般的男流研究。Acker（1994:57）在綜合一些資料後，提出女性主義研究具下列的核心預設：

- （一） 女性主義研究對於女人因性別而受苦的不平等現象，具敏銳的覺察力；
- （二） 研究的目的是改善女人的生活；
- （三） 女性主義研究將女人、性別置於人類存有各面向的中心位置；
- （四） 其以一信念為依據，認為現有的知識、技術有其缺憾，需加修正或替換；
- （五） 在父權體制下的女人經驗是研究的起始點：個人即政治的與有效的；
- （六） 研究者應與其探究對象（subject）位處相同的地位，而非採強有力或是分離的位置。

因之，具女性主義觀點的研究，係將性別當作探討社會現象的核心概念，並質疑、批判男性中心觀的知識，企圖致力於知識的轉型與理論的重建。此外，政治意圖亦是女性主義研究之一特徵，研究是婦運的一種實踐（Lather, 1991），研究可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基礎。

二、教育領導研究觀點的轉變

隨著女性領導者的日益增多，以及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西方教育行政界對於領導的概念逐漸產生變化。此處對於領導研究觀點的轉變情形加以探索，將有助於吾人解讀國內的教育領導研究。

傳統的領導理論將性別視為一中性因素，致使理論的建構遺漏了婦女經驗，男性思維與經驗被當成普遍適用於不同性別的規範與常模，蓋援引二例說明「性別盲」領導理論的建構。首以 F. E. Fiedler 為例，他在發展權變理論時，選擇的研究對象清一色是男性，樣本雖來自不同領域的代表，卻大多為白人男性（Shakeshaft, 1989: 159），故將女性經驗排除於外的作法在此可見一斑。另者，J. Burns 在其轉型領導理論中，雖認知到領導的性別觀點，卻是以「假置入」的方式處理婦女經驗。他在 462 頁的著作中，僅簡要地提及三位女性的領導行為；而在其贏得普立茲獎的領導著作中，對於一九二〇年代曾使用雷同詞彙描述轉

型領導者的 Mary Parker Follet，更是隻字未提。Follet 採女性觀點提出「分享權力」(power with) 代替「支配權力」(power over)；「關係的」(relational) 概念替代「科層體制」，然這些都未在 Burns 的文中被引用 (Gosetti & Rusch, 1995:21-22)。

吾人如進一步檢視這立基於實證主義的傳統領導理論如何異化女性經驗時，可以發現大多男性領導者所展現的特質 (如進取、成就導向、競爭、獨立等) 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領導特質，故當女性表現出傳統角色期望的女性特質時 (如重情緒的、直覺的、呵護的等)，即被認為是一不佳的領導者，致使婦女陷入一「雙重受縛」的處境 (Blackmore, 1989:100)。再者，女性缺陷 (deficit) 論常被用來解釋為何教育行政界多為男性的現象，女性的被動、缺乏進取心、畏懼成功是其「失敗」的原因，Acker (1994) 認為這種缺陷論的詮釋實則是一種責怪受害者 (blame-the-victim) 的行徑。

面對傳統理論的不足，教育行政學者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對於領導的相關論述開始有了一些轉變，概有兩類不同的研究取徑出現：一是珍視女性特質，以女性為探究主體，瞭解女性領導者的個殊經驗；另一則是以社會建構的觀點解析性別與領導，重視個體因應情境而建構不同的性別角色。

誠如 Noddings (1990) 所言，當女性擁抱自己的特質，拒斥不具批判性地同化於男人世界時，即進入了女性主義思考產生的一個重要階段。在一九八〇年代，社會科學領域中出現了著重女性特質的女性主義作品，如 Gilligan (1982) 挑戰正義倫理的思考，提出關懷的道德取向；Belenky 等人提出婦女的連結式認知 (Belenky, Clinchy, Golderberg, & Tarule, 1986；潘慧玲，1999)。而教育行政領域中亦漸有學者採取女性觀點進行女性領導者的研究；她們試圖站在女人立場，探究屬於女人的特質。

Rosener (1990) 在其女性領導的研究中，發現社會化與生涯路徑的發展影響了女性的領導風格，使其異於男性。Rosener 認為轉型領導係屬「女性的」(“feminine”) 觀點，她並指出，有一些傳統上被認為無效能，卻與女性連結在一起的特質 (如直覺、共識的建立、鼓勵參與等)，直至近來方被認為是可取的 (Gosetti & Rusch, 1995)。另 Helgesen (1990) 歸結其研究與 Gilligan (1982) 之作品，提出網狀的領導概念。她描述女性的領導是從組織的中心往外擴散；而男性則採由上而下的科層領導。領導起自中心就像是建立一個蜘蛛網，目標在於形成相互關連的團隊，與中心領導者連結在一起。

此外，Smith (1997:224-225) 企圖從女性主義觀點以及以技能為基礎的導向，進行女性領導的分析。她認為這樣的探究方式有幾項優點：(一) 此類取徑應用了許多婦女與經營的文獻，而這類文獻正好吻合現今強調組織中團隊工作

(teamwork) 的論點。(二) 這類研究擷取了最好的男性與女性領導風格，建議採取「陰陽同體」(androgynous) 的領導風格。(三) 此類取徑珍視多元化，強調不同種族、性別與文化社會中所需的多元技能與思考。(四) 此類研究在試圖說明性別是否會造成差異時，探究了許多獲致成功的因果關係，讓一些阻撓婦女成功的障礙因素得以呈現。就 Smith 的觀點看來，可發現其係試圖建立一融入男女特質的領導理論。

至於 Blackmore (1989) 則對教育領導進行一項女性主義的批判與重建。她指出教育行政界所盛行的領導理論係建基於講求抽象個人主義與科層體制理性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的自由主義，而在實證主義的支撐下意圖找尋人類行為與行政的通則。在此思考邏輯下，男性經驗便成為建構通則的基礎。Blackmore 對於強調個人主義、階層化關係、科層體制理性與抽象道德原則的父權領導觀點有著嚴重質疑，故而企圖以女性主義觀點重建領導的概念，而其中含涉一多層面 (multi-dimensional) 多方向 (multi-directional) 的權力概念。她認為領導是使他人得以彰權益能 (empower others) 而非以權力支配他人，因此她採關係的 (relational) 道德觀點，強調在人際互動情境中，所依賴的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而是彼此間關係、關懷與責任的考量，故領導宜側重個體間關係的營造與平等社群的形成。

對於上述以婦女為中心的研究，Schmuck (1996:352) 曾提出批判。她認為這類研究取徑對於社會現象的探討，過於偏重心理學的論辯，忽略了性別的社會建構；視婦女為一統一的概念，未注意到個別差異；另本質論立場恐將產生合理化學校中男女傳統角色的不利結果。

異於以婦女為中心的研究取徑，另有一些學者採社會建構的觀點檢視性別與領導，這類研究指出在公立學校中，婦女在行政人員中是少數，位處邊緣地位，故常覺得自己既是「局內人」(insiders)，又是「局外人」(outsiders)。在身為一「局內人」時，她們採行自己職位角色（如校長、局長、司長）所要求的行為、規範與期望，但因為性別角色的社會期望，她們無法像男性領導者一樣為人所接受，故形同一「局外人」，她們發現自己「並非男孩中的一個」，故必須找尋新的領導方式、新的自我認同方能存活 (Schmuck, 1996)。對於女性這種裡外不是人的境遇，Collins (1991) 稱其為「身處其中的局外人 (outsiders within)」。除了分析文化的性別角色影響學校中校長、教師角色的扮演，這類取徑亦對於人們如何在個人特質與組織角色規範的衝突下奮鬥，以及以女性為多的組織所形構出的是何等不同的文化。總之，社會建構觀點提供吾人另一視域，以理解學校女性行政工作者的生活世界 (Schmuck, 1996)。

參、國內教育領導研究的分析

從女性主義觀點來看，社會科學研究長期以來是在男性主導的（male-dominated）大學校院中產出。在這個體系中，女性聲音在學術階梯晉升過程的重重阻礙中，悄然緘默（Reinharz, 1985:157）。在整個以男性為中心的學術研究領域中，研究視角常受到侷限，因而忽略或扭曲女性經驗，而這些研究經由科學實証邏輯予以正當化，偏頗、片面地陳述社會現象，成為知識，更加穩固原來既有的男性中心思想脈絡。教育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支，亦難自外。本文透過女性主義觀點檢視教育領導相關學位論文研究，分析近十年來教育領導研究對於女性領導者經驗的關注程度及其關注面向，冀能提供未來從事教育研究者一個新的思考空間。

本文所分析的教育領導研究論文共 75 篇。首先係經由「中華碩博論文摘要檢索系統」，以「教育和領導」、「教育和決定」、「教育和溝通」以及「校長」等四組關鍵詞檢索到 1989 年至 1998 年的相關論文 55 篇；其後利用其他關鍵詞查詢到 7 篇論文。此外，赴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蒐尋中華碩博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中所闕漏的論文，計得 16 篇；另則補入 1999 年尚未納入該檢索系統之相關研究論文 4 篇，總計尋得論文 75 篇（詳見附錄）。在 75 篇教育領導相關學位論文中，以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及高雄師範大學產出較多，其中又以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產出為各校系之冠（整理如表一）。另外附帶說明的是，民國八十四學年以前各師範學院原設置的初等教育研究所，於八十五年後改稱為國民教育研究所，本文將其一併納入國民教育研究所計數。

表一：近十年教育領導學位論文產出校系分佈概況

學 校	臺灣師大		政治大學		彰化師大	高雄師大	東華大學	中正大學	中山大學	市北師院	新竹師院	臺中師院	嘉義師院	臺南師院	屏東師院	花蓮師院	國北師院
	教育研究所	其他	教育研究所	公共行政所	工業教育所	教育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企業管理所	國民教育所	國民教育所	國民教育所	國民教育所	國民教育所	國民教育所	國民教育所	國民教育所
篇數	14	4	18	1	1	10	1	1	1	4	2	3	1	4	3	1	6

從研究議題來分析近十年來的教育領導研究，發現以領導型式之主題列首，總計達 34 篇，佔總篇數的 45%。其餘研究則側重領導者權力運用、教學領導、行政決定、溝通、衝突管理及其他領導研究的相關面向（各類研究篇數統計詳見表二）。在領導型式相關研究中，有 18 篇論文係以 Ohio 州立大學企業研究中心（The Bureau of Business Research of Ohio State University）所提出之關懷（consideration）倡導（initiating structure）領導行為研究作為理論觀點，其次則以 J. M. Burns 與 B. M. Bass 所提出之轉型領導理論較為研究者所採用。

就研究方法而言，問卷調查法仍為多數研究者所採用。在 75 篇論文中，只有 1 篇採理論分析法，3 篇採觀察或訪談法，其餘 71 篇皆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唯其中另有 10 篇輔以訪談，增加資料來源。由此可以看出，在教育領導研究領域中，主要仍依恃量化的調查研究法。

表二：教育領導研究議題分類概況

研究議題	領導型式	權力運用	教學領導	行政決定	管理模式	行政壓力	衝突管理	行政溝通	領導特質	其他	總計
篇數	34	8	7	6	4	4	4	3	1	4	75
百分比	45%	11%	10%	8%	5%	5%	5%	4%	2%	5%	100%

由上述歸納整理，可看出近十年來教育領導研究關注議題及其所採行研究方法之趨勢。接下來將用女性主義觀點作引導，分析各論文文本之研究者立場、理論觀點、研究方法與研究議題，重點在於探究：（一）論文中呈現的是誰的聲音？女性的聲音是否妥適地出現？如果沒有，是以何種方式（如排除、假置入或異化）被消音或扭曲？（二）在考量性別因素時，係以何種立場進行探究？是以女性為主體，重視女性特殊經驗的陳述，抑或從歷史、文化、脈絡下探討性別的建構，從而檢視社會建構的傳統角色如何轉譯（translate）至工作場域中？（三）研究是否具有實踐的政治意圖，冀求從結構面、政治面、人際面促發社會變革？整個的論析涉及了方法論、知識論與政治的議題。以下即以是否融入女性經驗為規準，將所分析的論文分為三類進行討論：（一）未納入性別考量的研究，計 42 篇，（二）性別僅作為人口變項進行差異比較的研究，計 29 篇，以及（三）以女性為焦點的研究，計 4 篇。

一、未納入性別考量的研究

在所分析的碩博士論文中，未納入性別考量的研究共 42 篇，其中多數係完成於 1989 至 1993 年間，然近 5 年內仍有少數論文被歸入此類，如魯先華（1994）、張慶勳（1996）、林曜聖（1996）與李富美（1996）等。所謂未納入領導者性別考量的論文係指研究者在進行領導研究的過程中，並未考量領導者性別差異的可能影響，故在研究設計中並未納入性別變項。以下將由研究者立場及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等面向進行分析討論。

（一）研究立場

在此類論文中，研究者忽略領導者的性別因素，以男性樣本所得結果，作為描述全體領導者的依據。以林金福（1992）「國民中學校長領導型式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論文為例，研究者以校長領導型式、教師個人背景、學校環境及學校效能等為研究變項，以臺灣中部五縣市公立國民中學共 1,293 位教師為樣本，採問卷調查方式，從教師知覺的角度來探討校長的領導型式。然研究者在進行抽樣與編製問卷時，並未對於樣本教師所任教學校校長的性別加以考量。蓋目前臺灣地區公立國民中學校長係以男性為多數，故採隨機抽樣的結果，將產生研究中的校長以男性為多數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下，研究者根據教師群體所知覺之校長領導型式（多數為男性），進行全體「國民中學校長」領導型式的推論，顯見研究者以男性為社會主體正當性的立場。女性主義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鞭撻，揭露了性別觀點如何形塑與限制研究。在以男性為中心的脈絡裡做研究，必然容易產生男性觀點的研究。這樣的研究並不必然就是錯誤，但是，以此研究結果來統合代表男性與女性，亦即代表人的觀點時，便是錯誤的（畢恆達，1996:33）。研究者在排除女性經驗的學術場域中，對於自己所持的男性中心觀點常習焉不察，將研究男性的結果視為正當、視為規範，因而忽略了女性同樣地做為社會主體的地位及其特性，此類研究在教育領導領域中為數頗多。

（二）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

從近十年教育領導的研究議題來看，多集中於領導型式的主題，而研究理論觀點則以 Ohio 州立大學研究提出之關懷倡導領導理論數量最多，共有 15 篇。其次則為 B. M. Bass 於 1990 年所提出之轉型領導，及 P. Hersey 與 K. H. Blanchard 提出的情境領導理論等。在教育行政決定研究方面，則有王政彥（1992）所進行的團體式教育決策參與研究，以及李明華（1999）運用 H. A. Simon 決定滿意策略所進行的國民中學訓導主任行政決定研究。J. R. French 與 B. Raven 分類權力

運用類型，則是在教育領導研究中較廣為研究者採納，以作為權力運用研究之理論基礎。在教育行政溝通研究方面，則可見到 Polsky 與 D. Hellriegel 之溝通類型理論為研究者所採用。檢視此類論文所採用之理論觀點可以發現，多數研究者仍依賴西方早期所發展之教育領導理論。

在未納入性別考量的 42 篇論文中，除蘇永明（1989）運用理論分析法探究 A. Etzioni 順從理論對教育組織的啟示，以及李富美（1996）運用觀察與訪談研究校長角色與學校效能之關係外，其餘 40 篇皆係採用問卷調查法，輔以文獻分析法，另有 10 篇兼採訪談法。綜觀這類研究，多屬實證主義派典，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絕對二分(dichotomy)，研究結果的推論完全依據被研究者所提供的客觀證據，這種截然地區別與分離是十分危險的，且同時貫徹了父權文化特徵（Reinharz, 1985:158）。研究者透過分割的問卷試題，很難深究受試者的想法與生活經驗，統計數字與源自於被研究者的訊息則由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世界的分離而成為表面及片段理解。

就研究對象而言，由於研究者大多從部屬對領導者領導行為或特質的知覺進行研究，因此研究對象多為公立學校教師。只有蔡英士（1989）研究國民中學主任行政決定行為時直接對總務主任進行問卷調查，另外則有 8 篇論文兼以領導者及被領導者為對象發送問卷，其餘則全數以被領導者的知覺來取得資訊，故實際對於領導者本身進行探討的論文只有極少數。

綜觀此類型的研究未能考慮被研究者（領導者）的性別變項，忽視女性的獨特性，單純使用男性觀點進行研究設計，解讀研究結果，不但無益於女性問題的理解，甚且邊緣化了女性議題。

二、性別僅作為人口變項進行差異比較的研究

近十年教育領導研究中，將性別作為人口變項進行比較分析的論文共有 29 篇。所謂以性別作為人口變項進行差異比較研究，係指研究者進行研究設計時，亦將領導者本身的性別納入領導者個人背景變項中作考量，試圖透過研究了解領導者特質或行為是否具有性別差異，或性別是否會與其他變項對於所欲探究的依變項產生交互作用效果。

（一）（一）研究立場

在此類研究中，研究者已覺察領導者性別可能對於領導者本身領導行為、組織文化有所影響，並進而對被領導者產生不同程度或層面的影響，因此開始在研究中重視性別變項的探討。相較於前類研究，此類研究已漸漸關注女性經驗。然而，研究者對於女性經驗的關注仍僅止於試探性別差異的階段，研究者站在男性

霸權的文化脈絡中，利用已然建立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研究規範、知識價值體系來探求，以發現不同性別領導者間的差異，故並未真正深入地去了解、探究女性領導者真實的生活及工作經驗，以及造成這些差異其背後深層的社會文化因素。易言之，這類研究雖然納入女性樣本，但仍以男性思維解讀研究結果，故可視為是以一種「假置入」的方式處理婦女經驗。

(二)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

在此類 29 篇研究中，全數採用問卷調查法，其中洪裕欽（1994）、施妙曼（1995）、蔡秀媛（1998）、葉龍源（1998）及張碧娟（1999）則另輔以訪談，可漸漸感受到近年來質性研究派典對於研究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影響。

此類研究較前類在研究議題上更多元化，故理論觀點亦隨之多元。在領導行為方面的論文，仍以 A. W. Halpin 在 Ohio 州立大學所提出的關懷倡導理論為主，其餘則有 B. M. Bass、G. Yukl 轉型領導以及 F. E. Fiedler 權變理論等。在教育行政決定研究方面，有 D. E. Griffiths 行政決定類型理論；而除了 J. R. French 與 B. Raven 權力劃分類型理論之外，此類研究權力運用之相關論文尚採用 A. W. S. Porter 以及 R. L. Peabody 等之權力運用基礎及策略。其他如衝突管理研究方面有 LINDELOW、Scott 衝突管理策略，呈現多樣的研究主題。然而，早期西方教育領導理論，係依據問卷調查之實徵研究數據發展而成，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缺乏女性領導者經驗融入所發展的領導理論，是否仍適用於現今女性領導者日益增多的社會，則是一個亟待反省思考的議題。茲以國內教育領導研究常引以為理論基礎的 Ohio 州立大學倡導關懷領導理論為例。A. W. Halpin 在 Ohio 州立大學企管中心發展出一套「領導行為描述問卷（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簡稱 LBDQ）」，其後於 1959 年利用 LBDQ 問卷對美國中西部學校教育局長的領導行為進行調查研究，提出領導行為中關懷、倡導兩大因素，建構了領導行為論中極重要的關懷倡導雙層面理論。然而，當時美國教育局長中女性比例極低，全國約只佔 2.1% 甚或更低的比率（Shakeshaft, 1989:20）。在缺乏女性領導者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問卷及領導理論是否適用於評估女性領導者，這是我們所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再就研究對象討論時可以發現，此類研究在研究對象及數目的掌控上，實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以羅富山（1989）研究國民中學校長學校組織體系內、外在工作壓力狀況調查研究為例。研究者以台灣地區公立國民中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個人知覺學校領導工作內外壓力來源，經由 t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校長工作壓力差異之後，研究者得到一研究結論——不同性別校長感受之工作壓力沒有差異。然而，細究其研究設計，發現在 429 位校長研究對象中，只有 10 位是

女性校長，其餘 419 位校長皆為男性。在女性樣本數過小的狀況下，所得之研究結論有值得再商榷之處。另者，蘇進棻（1991）在探究國民中、小學校長角色衝突與工作滿意關係時，選取國民中、小學校長共 515 人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校長 452 位，女性校長則僅有 63 位。同樣地，簡顯經（1992）在其「國民中學校長行政決定運作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論文中，研究對象亦為台灣地區公立國民中學校長，研究結果推論不同性別校長在做決定過程中並無差異。然而，究其研究對象，發現女性校長只有 26 位，男性校長則高達 467 位，性別比例懸殊甚大！類似的問題亦出現在劉邦富（1990）、歐源榮（1995）、胡峻豪（1997）、蔡秀媛（1998）等人的論文中。

在這類研究中，性別雖進入研究者的視域，然其僅被當成人口變項進行統計的差異分析，男性觀點的領導理論仍被作為詮釋與分析的架構。因之，誠如 Abbott 與 Wallace（1997）所批判的，當性別被放入研究中作為探討的變項時，它們通常僅具附加性價值，研究者常忽略檢視自己所用的理論是否具有多元觀點的正當性，使得女性聲音隱而不彰。

三、以女性為焦點的研究

以女性為焦點的研究係指研究者異於以往利用抽樣調查，將性別納入變項考驗差異的研究，而是直接關注女性領導者，以女性領導者作為研究主體，探究其領導相關之行為或特質。

在教育領導研究領域中，以女性為焦點進行研究，最早除了楊雀在 1982 年曾經研究我國女性教育主管人格特質之外，一直到 1992 年蔡美儀才又提出女性教育主管性別角色、自我概念、社會支持與工作適應關係之研究。有趣的是，這兩篇論文都是出自於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並且都是探究女性教育主管的個人特質，對於女性領導者之實際領導行為則未加以關注。之後直到 1996 年方才陸續出現了女性教育主管領導行為之研究，如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黃麗蓉（1996）研究國內企業界及學界領域共十位女性領導者之領導行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李玉惠（1998）研究國民小學女性校長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程度，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侯怡楓（1999）進行一位國小女性校長領導實際情形。由於本文旨在分析近十年教育領導研究，因此剔除楊雀 1982 年所提出之研究論文，則自 1989 至 1999 年止，總計共有 4 篇以女性為焦點的研究論文。

(一)研究立場

研究者以女性領導者為研究焦點，以彰顯女性在教育領導領域中的真實情況，轉化走入女性主義研究領域。Truman（1994:32）認為讓女性在社會科學研

究中被看見 (visible) 是不足夠的，而應該努力地讓女性不同的、多樣化的生活經驗能夠完整地呈現出來。教育領導研究轉向直接關注女性，總算讓女性領導者聲音得以展現。不過，這類論文多著重於在既存社會結構下對女性經驗作描述，並未將實踐的政治意圖融入研究中。

(二)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

相對於國外對於女性領導相關研究的蓬勃發展，國內女性領導研究則尚處於啟蒙階段。在國內教育領域中，性別研究多集中於教室中的教學觀察或教科書內容的檢視，教育行政領域則較少碰觸此議題。長久以來，男性主導行政領導實務及研究工作，對於女性議題較不重視，故於近十年來，國內教育領導研究領域以女性領導為焦點所進行的研究總共只有 4 篇，在數量上顯得極為罕少，而在研究議題上亦仍有許多領域亟待開發。

正如前述，在教育領導研究領域中，除 1982 年楊雀曾經提出女性教育主管的研究之外，以女性為焦點的研究直到 1992 年才又再出現。蔡美儀 (1992) 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我國女性教育主管性別角色、自我概念、社會支持與工作適應之關係。Bem 的性別角色量表在論文中被用來測量教育主管的角色類型，研究者並檢視性別角色、自我概念、社會支持、與工作適應是否因性別而有所不同。可惜的是本篇論文雖名為「我國女性教育主管」研究，但實際上研究對象卻包括來自台北市、高雄市不同性別的國民中小學校長與主任。樣本總計 574 人；其中男校長 46 人，女校長 43 人；男主任 242 人，女主任 243 人。由於該論文未將焦點全部置於女性領導者身上，故就其性質實應歸入前一類別——僅將性別作為變項考量的研究，唯本文因其論文題目僅放入女性主管而將其歸入此類。

另 1996 年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黃麗蓉發表「組織中的女性領導」，採質性研究派典，針對國內 12 位公、私部門女性主管進行深度訪談，包括公部門五位，私部門五位，婦女研究學者一位，婦運領袖一位。其中教育界女性領導代表，黃麗蓉選取當時國立編譯館館長趙麗雲為對象。本篇論文研究對象雖兼含國內學術界、企業界各領域女性領導菁英，並非完全針對教育學界，在此以其部份相關而納入此類研究。在該論文中，訪談結果發現女性主管的領導風格多符應了研究中文獻探討所歸結的五項女性領導者特質，即「互動型的領導風格」、「組織關係成包容性的蛛網狀」、「全觀而多元的思考方式」、「授能及團隊建立」與「重視員工的教育與成長」等。而此五項特質大部份歸納整理自國外文獻包括：J. B. Rosener、S. Helgesen 及 L. J. Shepherd。對此，研究者並未加以省思，其未能考慮到不同組織特性可能對於領導者產生影響。以 Helgesen 的理論為例，她的研究對象是自營公司的女性領導者，在這類組織裡，領導者可以富有創意且彈性地

管理，建立新的蛛網組織結構（林宴夙、徐荷譯，1995）。但是在父權文化深植的學校組織中，女性領導者可能就會受到許多的拘限。此外，當研究者檢視家庭對女性領導風格的影響時，僅僅提出女性應獲得家人的支持與協助。這樣的詮釋，恐將使女性再度陷入傳統社會期待的窠臼中，因為長久以來，女性角色被侷限在家庭中，她們必須承受來自社會外界對於母職形象的期望！

在教育研究領域中，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李玉惠亦於 1996 年撰寫以女性校長為研究焦點之論文。李玉惠採用問卷調查法了解我國國民小學女性校長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需求。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市公立國小女性校長共 86 人，無男性校長，是一單純以女性作為研究焦點的論文。研究結果發現女性校長在處理校務時，會知覺到來自多方面的工作壓力，其中以執行「校長職責」時最常面臨工作壓力情境，而「角色期望」則造成最大困擾。此外，女性校長在面對工作壓力時「時常」可獲得社會支持。李玉惠之研究係純以女性校長為研究焦點，因此在研究設計過程中可以專就女性領導者經驗來考量。例如研究者特別透過問卷，關注女性校長是否會在傳統社會性別角色期望與校長角色期望兩者之間產生角色間衝突問題。然而，發掘問題應只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開端而已，深入地去了解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並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方才為研究的積極意義，女性研究尤其然。李玉惠之研究係教育領域中第一位專就女性校長為研究焦點者，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然而，其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被研究者可能受到研究者及社會期望的影響，而未能做出符應心中所想回應。此外，以實徵數據來呈現女性校長工作壓力及社會支持現況，無法讓人深入理解女性真實生活經驗的呈現及開展。例如當研究者獲得研究結論——校長執行「校長職責」時最常面臨工作壓力情境，卻未能更深入地去探討學校組織及教育行政組織結構對於女性校長執行職責的阻力與助力，亦即對於工作壓力來源的社會文化結構面並未加以處理。

此外，侯怡楓（1999）採質性研究，使用觀察法與深度訪談進行「一位國小女性校長領導實際之個案研究」。她突破教育領導領域長久以來依賴的問卷調查法，實地進入研究參與者的生活情境，以三個月的時間觀察一位國小女性校長，所蒐集的資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會議參與紀錄、學校文件、對話記錄、校長工作表現記錄以及訪談記錄等。研究者將研究結果區分為兩大部份呈現：校長實地工作分析與女性領導特質與方式之分析。在前一部份中，研究者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引用張清濱、趙廣林、E. B. Goldring 和 S. F. Rallis、T. E. Deal 和 W. H. Roe、以及 T. L. Drake 和 W. H. Roe 等人所提出之校長工作任務或角色之分析，作為其論文中該部分資料分析的依據。研究者透過觀察，詳實地檢核了該位校長的實地工作情況，並舉例說明該位校長各種角色類型的符應情形。見聞教育領導

領域中產出一純粹以女性校長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的確是令人感到欣喜的。然在詳探其論文內容之後，感到些許遺憾，因為研究者仍未能跳脫出傳統教育行政領導研究的思路宰制。研究者雖以觀察、訪談等方式來了解女性校長實際的領導行為，但整個研究卻仍以男性文化體制下所形塑出的校長角色分類，去一一檢核甚或「採證」該位校長的領導角色及行為。在女性領導特質分析部分，研究者首先透過國外相關文獻的蒐集，諸如 S. Helgesen 女性領導「魔術師模式」、M. Loden 授權式小組團隊工作方式，另外配合 D. M. Smith 所提出四種領導方式：授權式領導、推選式領導、分享式領導、以及有距離的領導，形構出一個所謂的女性領導方式的「要素」。而後，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再度拾起女性領導方式要素來檢核該位女性校長，發現該國小校長確實會建立起環狀的組織關係，並進而產生女性領導者直接溝通的特質，但其領導權力基礎並未如 Helgesen 所言建立於人際關係上，而是偏向以法職權為基礎；研究者並提出該校長似乎少有授權的行為等結論。在女性領導特質分析部份，研究者雖非如同前述，將傳統男性文化大帽強扣住女性領導者，但卻套用他國理論進行對照詮釋。這樣的作法，顯現研究者實證主義知識論的立場，行文中充滿驗證理論的味道。另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並未對於自身、研究參與者、以及研究參與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進行性別意識的深刻反省，以致未能彰顯研究參與者同時身為女性與領導者，其個人真實經驗的獨特性及意義性，甚為可惜。

以上分析的四篇論文雖各有闕漏不足之處，然其對於突破傳統性別窠臼的枷鎖，以及深化對女性經驗與性別議題的理解與知識的汲取都有所助益。論文所採用的理論，如 B. Rosener 的互動型領導風格、S. Helgesen 與 M. Loden 所提出的女性領導概念、以及 D. M. Smith 所歸結的四種女性領導方式，概為美國重要的女性領導理論，由此又顯見國內女性領導的研究多尾隨美式理論而行，卻未考慮台灣本土與美國文化上之隔閡與差異，教育理論本土化的問題再度浮現。

肆、綜合分析

綜觀近十年教育領導研究的學位論文，呈現了理論觀點的日趨多元，新近者採擷九〇年代以後興起的轉型領導理論，更有研究者使用受到女性主義影響所發展的領導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早期教育行政研究多採用量化的問卷調查研究法，邇近則有研究者在問卷調查之外輔以訪談。另外，在 75 篇論文中，除 1 篇採理論分析法，只有 3 篇論文主要採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可見教育領導研究仍無法脫離實證主義研究派典的侷限。除了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的演變外，

以女性主義觀點檢視本文所分析的論文，概呈下列現象：

一、以男性中心觀點的闡釋為主

綜觀文中所分析的論文文本，可以發現性別因素並未進入多數研究者的探究視野，此可反映在 75 篇的論文中，有 42 篇（佔 56%）未納入性別變項的考量。而在這類論文中，女性經驗被排除，研究者並未挑戰以男性代表社會全體觀點的正當性。另在 29 篇（佔 39%）的論文中，研究者開始注意性別變項，然其僅被當成人口變項，進行男女差異性的統計分析。研究者以男性為中心的分析架構仍未改變，因此，女性經驗此時僅是形式性地被置入，女性的主體地位並未彰顯。直至 1992 年，開始出現以女性為焦點的研究（4 篇，佔 5%），唯其中有一篇雖以女性主管為論文名稱，所探究的對象仍涵蓋男性，故如剔除該篇，在教育領導研究的學位論文中，至今僅發現有三篇是以女性主管為焦點所做的研究。

然將女性作為研究中探究的主體時，並不代表就是排除了男性中心觀點，在本文所分析的論文中，便可發現研究者在解析女性校長的工作壓力與社會支持時，未能解構深植於社會文化脈絡的價值觀與結構因素，恐將導致女性經驗的異化。在另外的兩篇論文中，女性領導特質開始受到重視，研究者使用 J. B. Rosener、S. Helgesen、M. Loden、D. M. Smith 等人所發展的女性領導理論，開拓了檢視女性校長領導的另一視窗。雖然研究者在論析家庭對於女性主管的影響時，落入了傳統對於母職社會期待的思考窠臼，但其嘗試跳脫男流領導理論，試圖站在女性立場探究女性特質，累積女性領導的經驗，對於重建一涵攝男女觀點領導理論的努力，有其貢獻。

二、實證主義知識論的立場強化了以男性為常模的領導理論

Popkewitz（1984）曾提出教育科學有三類的研究派典：經驗分析（empirical-analytic）科學（或稱實證主義派典）、符號科學（或稱詮釋/現象學派典）與批判科學。其中經驗分析科學派典認為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是獨立存在，有待研究者去探掘的；知識是客觀、可檢證的；真理是唯一的，而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尋求一共通的社會律則。在這樣實證主義知識論立場下，位於主流優勢地位的男性，其經驗與觀點便很容易地被當成唯一的「真理」。

在本文所分析的 75 篇論文中，可發現縱貫十年的時程中，早期研究者偏向使用問卷調查等量化方法蒐集資料，近期則有研究者開始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諸如參與觀察、晤談等。研究者在方法的使用上縱或有不同的取向，但其背後所反映的則仍是濃厚的實證主義知識論立場，在研究者採用未具性別觀點考量的理論時，男性規範便成為衡量不同性別者的準繩。Blackmore（1989）即曾指出立基

於實證主義的組織領導理論，其所仰賴的經驗研究係以位居正式的領導職位者為研究對象，而這些對象通常是男性，因此，男性領導者所展現的特質、行為便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領導風格。由此觀之，實證主義觀點的採用對於父權文化的貫徹有其推波助瀾之效。

三、他國理論的套用影響了本土女性領導研究視域的開展

觀諸女性主義思潮在發展的進程中，有些流派的主張被斥為專屬於西方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於是階級、種族、文化脈絡的變項撼動了「婦女」成為一普遍化（universal）概念的可能性，「婦女」本身蘊含許多的變異性。然在本文所分析的兩篇以女性經驗探索為主的論文中，外國學者所發展的女性領導理論被用來解釋所蒐集到的實徵資料，其隱含著研究者對於婦女所持的基本假定：婦女為一統一不變的概念；婦女的經驗無國界之分。雖然論文文本中指出某部分的女性領導風格易於西方理論，然研究者卻未能從文化脈絡解析本土婦女的個殊經驗，亦未能跳脫西方理論的拘限，建構本土婦女的領導觀點。另在其他未考量女性經驗的論文中，亦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理論的套用，如此作法，不但無法貼切地詮釋本土經驗，甚且可能造成扭曲，影響本土教育領導研究視域的開展。

四、欠缺社會建構的性別觀點分析

西方學者在探討女性領導者時，誠如前述有著重婦女經驗的本質論立場，亦有著重社會建構的性別觀點。以本文所分析的國內學位論文而論，蓋有兩篇採質性方法，分別針對 12 位公私立部門女性主管與一位國小女校長進行研究。以西方女性領導文獻為參照基礎，這兩篇論文的研究者著重於女性主管領導風格的描述，她們在資料的分析與詮釋上，重在比對、檢核理論與實徵資料的符合程度，對於性別在歷史、文化或社會脈絡下如何被建構，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如何複製於公領域中，女性在工作場域中如何突破「身處其中的局外人」困境以尋求新的角色認同等議題，惜未能加以著墨。

五、未能彰顯研究作為實踐的政治意圖

女性主義的實徵研究源自不同的傳統，秉持不同的知識論立場。有的出自傳統的實證主義派典，有的出自詮釋的/現象學派典，有的則出自批判、實踐導向派典。採批判理論觀點的女性主義學者 Lather(1991)，曾提出研究即實踐(research as praxis) 的看法。她企圖透過實徵研究發揮彰權益能(empowering) 的功能；在研究設計中，擴大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對話的與辯證的教育會晤(encounter)，期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雙方都能成為「改變者」與「被改變者」。以此觀點檢視

本文所分析的研究，則除採理論分析法的一篇論文外，大多的論文均屬實證主義派典下的產物。事實與價值分離，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保持獨立與疏離的關係是這類派典的主張，因而，將研究當作一彰權益能的方法，以提升研究參與者的意識，並促進社會行動的落實，這種作法尚未在國內的教育領導學位論文中看到。

伍、結語

教育領導理論發展至今，可看到觀點的推陳出新，不同性別族群的經驗與想法漸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西方，有些學者受到女性主義思想的啟發，挑戰既有獨尊男性的知識體系，將性別置於議題探究的中心，在這部分已累積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另有一些學者並非明顯直接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但也提出一些與女性主義觀點若合符節的主張，例如 Dunlap 與 Goldman (1991) 的「催化權力 (facilitative power)」概念——權力在平等關係的基礎上行使，以促進他人的能力，並對他人提供支持與協助。Sergiovanni (1993) 呼籲教育領導應是催化的、彰權益能的、參與的。而 Leithwood (1994) 則述及轉型領導的特徵是建立共同願景、持續不斷的評鑑與致力於他人表現的提昇。這些觀點的提出應與教育界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行政工作有關。

反觀國內的教育領導研究，性別觀點的融入是近幾年才有的，而在經常能反映研究趨勢的學位論文中，致力於女性領導的耕耘仍舊有限。因此，在位處學術領域開發階段，我們是否應當好好思考研究策略的問題。首先，面對的是學術研究本土化問題。

他國理論與概念的移植、套用，扭曲了本土經驗的詮釋與喪失了學術研究的主體性，是國內社會科學界三十多年來所關懷的議題^[1]。然而，這樣的關懷並未具體地反映於教育學領域中，過去偶有學者進行評論（如伍振鷺、陳伯璋，1985），但卻鮮見本土教育學的研究成果出現，在本文分析的學位論文中，即多呈現西方理論的引介。其次要面對的是研究派典問題，對於以實證主義為主流的社會科學研究，有不少西方學者加以質疑，進而發展出不同的研究派典。在國內，亦有學者對此議題進行省思（如黃光國 1995；葉啟政，1993），呼籲社會科學研究者必

^[1] 國內對於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省思可溯及於一九七五年（楊國樞，1993），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當時「中國化」的口號已改為今日的「本土化」。在致力於本土化的進程中，以心理學領域的耕耘最為持續與深入。教育學領域於 1999 年 6 月所舉辦的「教育科學：國際化或本土化？」是匯集學者省思的一個良好開端。

須檢討實證主義派典的知識論與方法論，進行派典的轉移，針對國內教育領導研究者濃厚的實證主義知識論立場，是否宜有所調整，是必須思索的一項課題。

因此，本文建議在進行本土女性教育領導的研究時，尤其現處一學術開發階段，應當擺脫實證主義的立場，去除不加批判地套用他國理論的態度，實際紮根地探掘女性個殊的經驗。這樣做的目的，套句葉啟政（1993:192）的話，是「為整個人類之學術論說提供另外可能的理解選擇，以豐富人類瞭解世界的空間」。期待本文的探索，能漸開啟教育界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重新思考教育領導理論中女性經驗與觀點的定位；並希望透過不斷地累積多元議題的女性領導研究，能重建一融入兩性經驗與視域的領導理論。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88 年 10 月 30 日台北市立師範學院主辦之教育行政論壇第五次研討會。作者在此特別要對研討會與會人員及稿件審查者所提供之意見表達感謝之意。）

參考書目

- 伍振鷺 陳伯璋(1985) 我國近四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初步檢討, *中國論壇*, 21(1), 230-243。
- 林宴夙 徐荷譯(1995) *女人的領導風格* 譯自 S. Helgesen 著 *The female advantage: Women's ways of leadership*。台北：允晨。
- 俞智敏 陳光遠 陳素梅 張君玫譯(1995) *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譯自 P. Abbott & C. Wallace 著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台北：遠流。
- 黃光國(1995)。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中的世界觀：論「以牛刀切頭髮」。 *本土心理學研究*, 4, 380-413。
- 畢恆達(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主編,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頁 27-45)。台北：巨流。
- 楊國樞(1993) 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 *本土心理學研究*, 1, 6-88。
- 葉啟政(1993)。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本土化」。 *本土心理學研究*, 1, 184-192。
- 潘慧玲(1999) *Belenky 等人的女性知識論*。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主辦：性別與教育論壇。11月26日。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 Abbott, P., & Wallace, C.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 Feminist perspectives* (2nd ed.). London : Routledge.
- Acker, S. (1994). *Gendered education: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women, teaching and feminis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lenky, M., Clinchy, B., Golderberg, N., & Tarule, J. (1986). *Knowledge, difference and power: Essay's inspired by "Women's ways of know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Blackmore, J. (1989).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 feminist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In J. Smyth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p. 93-131).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 Collins, P. H. (1991).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r within. In M. M. Fonow, & J. Cook (Eds.), *Beyo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Dunlap, D. M., & Goldman, P. (1991). Rethinking power in school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7(1), 5-29.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setti, P. P., & Rusch, E. (1995). Reexamin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Challenging assumptions. In D. M. Dunlap, & P. A. Schmuck (Eds.), *Women leading in education* (pp. 11-35).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arding, S. (1987).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S. Harding (Ed.), *Feminism & methodology* (pp. 1-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elgesen, S. (1990). *The female advantage: Women's ways of leading*. New York: Doubleday.
- Lather, P. (1991). *Getting smart: Feminist research and pedagogy with/i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 Leithwood, K. (1994). Leadership for school restructur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30(4), 498-518.
- Noddings, N.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oddings, N. (1990). Feminist critiques in the professions. In C. Courtney (Ed.),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ERA.
- Noddings, N. (1992). *The challenge to care in school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Popkewitz, T. S. (1984). *Paradigm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Riehl, C., & Lee, V. E. (1996). Gender,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In K. Leithwood, J. Chapman, D. Corson, P. Hallinger, & A. Hart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Part 2* (pp. 873-919).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Reinharz, S. (1985). Feminist distrust: Problems of context and content in sociological work. In D. N. Berg, & K. K. Smith (Eds.), *The self in social inquiry: Researching methods* (pp. 153-172). CA: Sage.
- Rosener, J. B. (1990). Ways women lea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Dec., 119-125.
- Schmuck, P. A. (1996). Women's place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K. Leithwood, J. Chapman, D. Corson, P. Hallinger, & A. Hart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Part 1* (pp. 337-367).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ergiovanni, T. (1991). *The principalship*. New York: Allyn & Bacon.
- Shakeshaft, C. (1989). *Women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London: Sage.
- Smith, D. M. (1997). Women and leadership. In P. G. Northouse (Ed.),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04-23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hiele, B. (1987). Vanishing act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Tricks of the trade. In C. Pateman, & E. Gross (Eds.), *Feminist challeng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Tong, R. (1989). *Feminist though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Truman, C. (1994). Feminist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research: Have they gone far enough? In B. Humphries, & C. Truman (Eds.), *Re-thinking social research* (pp. 21-36). England: Avebury.
- Weiner, G. (1994). *Feminisms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these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n Taiwan: Feminist perspectives

Hui-Ling Pan

Professor

Dept. of Educ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Wen-Chen Liang

Master Student

Dept. of Educ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i-Hsuan Chen

Master Student

Dept. of Education

Taiwan Normal

ABSA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aiwan'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aster's thes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these recent ten years using feminist perspectives. Feminist perspectives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research i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d. Then the analysis of the theses is presented, mainly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1) Whose voice is present in the text? (2) How gender is analyzed? (3) Is research viewed as praxis? After analyzing studies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in Taiwan, it was found that influenced by positivist paradigm, most researchers us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addition, androcentric perspective has dominated the authors' viewpoints. Out of the 75 theses, 42 were ignorant of the gender factor. In the other 29 theses, sex/gender was only built in as a demographic variable to examine sex/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theses with women as subjects, only two embrace some kind of female perspectiv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still plenty of rooms for investigating women's experiences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studies.

Key word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women leadership, principalship, feminist perspectives